

货币的政治逻辑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

赵 柯

内容提要: 货币不仅仅只是市场交易的媒介,更是一种权力,它不仅对社会财富具有“分配效应”,同时也能够为货币发行者直接带来财富,货币从产生到被普遍接受与国家权力密不可分,这就是货币的政治逻辑。货币的权力特征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往往不能遵循以“效率”为原则的市场逻辑,而是充满着国家间的博弈和斗争。美元在崛起的过程中并不仅仅依赖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也是美国政府积极运作的结果。美元所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欧元和人民币的竞争,更在于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国家和日本能否在今后一如既往地支持美元,以及美国能否获得以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货币问题上的合作。

关键词: 货币权力 政治逻辑 国际货币体系 美元 欧元

引 言

主流经济学认为,货币起源于市场,货币的主要功能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货币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承担着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藏的职能,解决的是经济运行中的“效率”问题。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许多货币问题并非完全遵循市场逻辑来演变,并且很多时候与“效率”原则背道而驰。比如,在1971年前后,当外国人所持有的美元资产达到500亿美元,而美国的黄金储备是150亿美元时,许多国家就对美元币值稳定的信心产生动摇,美元遭抛售,美国黄金储备急剧减少,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

^{*} 笔者感谢《欧洲研究》匿名专家的评审意见,感谢美国俄勒冈大学罗纳德·米切尔(Ronald B. Mitchell)教授提供的最新资料。

系的崩溃。到了2010年,当美国政府公共债务超过9万亿美元这一天文数字,并且债务规模还在不断膨胀时,^①美元贬值的风险明显要远远大于1971年,但是美元却没有遭遇抛售,为什么现在的美元资产持有人与1970年代如此不同,甘冒如此大的风险?当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官员与美国金融专员办公室官员会面时,“台湾问题”竟然成为双方讨论的一个议题,^②两国金融官员的议程为什么会涉及传统上属于外交领域的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经有许多技术上可行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案出台,但却从未有一个方案真正被实施过,为什么这些体现效率原则的设计总是被各国政府所抛弃?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货币天然是一种权力,除了市场逻辑之外,还有一个政治逻辑,并且后者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更有助于理解货币问题的本质和现实。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货币又一次成为国际政治博弈中的焦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成为各国政府关注和相互角力的中心议题,这其中的核心无疑是谁将取代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需要探寻决定美元主导地位形成和可持续性的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在当今是否发生了变化?作为后来者的欧元和人民币是否有能力和资格与美元竞争,进而成为国际货币?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把握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方向,而货币的政治逻辑是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的关键。

一 货币政治逻辑的内涵

货币的政治逻辑可以分为三个层面:货币的起源、货币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以及货币的本质。首先,在货币的起源问题上,主流经济学一般都否认货币是一种国家制度,起源于政府的法律,^③而是认为人们对市场交易便利性的需求导致了货币的出现,这种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提供的解释是:我们交换的任何东西都需要比较(它们的价值)。这导致货币的介入,并充当一般等价物。这一普遍被接受的理念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因为它在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之间做简单对比,但并没有解释清楚这解决问题的办法(即货币)是如何得出的。这就好比说:一天早上,一个交易者突然非常精明地通晓了货币交换

^① “Federal Debt and Interest Cost”,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December 2010, p. 26.

^② 路透中文网报道,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AnalysesNews/idCNCHINA-3844820110222>, 2011年3月1日最后登录。

^③ Karl Menger, “On the Origin of Money”,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2, No. 6, 1892, p. 255.

的好处,于是,从那天下午开始,他便忙于将某种商品充当货币。或者,某个国家明智的君主提出将某种商品核定为一般交换媒介。^①这显然将货币的起源简单化地归结为人们自发、同时和统一的自然选择,但却将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到货币最终产生之间这“惊人的一跃”所经历的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省略了,特别是抽掉了国家权力在其中的作用。

这种单纯从市场角度理解货币的观念被古德哈特定义为货币的M理论(Metallist),他认为对货币的认识更接近历史经验事实的是货币的C理论(Cartallist),也称为“货币的国家理论”。C理论认为,货币的起源和私人部门为最小化交易成本的经济活动根本无关,而是和主权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是货币发行当局的权力(Power)决定了货币的使用,一种物品成为货币并不在于其材质是金银还是纸张,而是在于其上面印刻的国家主权的标记,货币背后是国家的信用和权威。货币的出现和主权国家获取财政收入的活动密切相关,统治者引入货币一方面使得征税变得容易(税收货币化),同时也便利了国家的公共支出(实物支出变为货币支出),这种便利性客观上也减少了私人部门之间的交易费用。政府强制要求用货币上缴税款的规定使得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加大,由于政府垄断货币发行,它又可以向社会注入基础货币,从而获取丰厚的铸币税收入。^②

德国经济学家南普(Georg Friedrich Knapp)是C理论早期的代表人物,他通过逻辑推理论证了货币与国家密不可分。^③南普承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以自发、自由地选择任一合适的物品担任一般等价物来作为相互交易的支付手段,可以是贵金属,也可以是粮食等实物,从而克服物物交换的不便,但是由于国家的存在,国家可以自由地运用权力规定现存的哪一种一般等价物——或者国家另外指定一个物品——可以作为人们缴税的支付手段而被国家所接受,同时国家还可以自由地规定其他一般等价物与这种国家认可的法定支付手段之间的价值比率。由于在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中,国家在事实上是整个商业活动的结算中心(政府的征税活动涉及全国所有的商业活动,并且政府的支出和收入规模一般都要大于任何单个机构和个人),任何个人和机构在与国家发生支付业务时都必须使用法定的支付手段,这使得那些与国家有支付往来的个人和机构和

① [美]劳伦斯·H·怀特《货币制度理论》,李杨、周素芳、姚枝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② Charles A. E. Goodhart, "The Two Concepts of Money: Implications for the Analysis of Optimal Currency Area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 1998, pp. 407 - 432.

③ Georg Friedrich Knapp, *The State Theory of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24, pp. 1 - 113.

其他与国家没有直接支付往来的个人和机构交易时,也倾向于接受法定支付手段,以便于以后与国家结算;这种偏好进而促使剩下的那些与国家没有直接支付往来的个人和机构之间相互交易时也使用法定支付手段。最终,这种以国家权威为支撑,通过政治权力确保其流动范围不断扩大的法定支付手段就战胜了其他私人部门的一般等价物,成为国家货币。在南普的逻辑中,国家的接受和认可,国家权力的推动是一种一般等价物成为货币的决定性因素。雷(L. Randall Wray)进一步发展了南普的“货币的国家理论”,特别是对现代国家货币——纸币的本质进行了分析,他继承了南普“国家创造货币”的基本观点,认为一旦国家要向民众征税,并且要求民众用国家垄断发行的货币来缴税,国家就可以通过制定民众如何才能得到这些货币的条件来影响货币的价值。与其说政府需要民众的税款来维持开支,不如说是民众需要政府的钱来缴税,因为政府作为货币的提供者,可以“买”任何以政府发行的货币标价的商品。税收机制创造了人们对国家货币的需求,所以国家货币的价值更多是取决于国家的征税能力和征税机制,国家货币因此可以理解为税收驱动货币(Tax-drive-money)。^①南普和雷的分析充实了主流经济学范式里“对货币的需求”与“货币的最终出现”之间所存在的“空档”,在货币的发展史中重新找回了国家,他们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货币现象为什么总是离不开权力的阴影,因为一种物品最终成为货币不仅仅是市场的逻辑使然,更在于其背后的国家权威,以及国家权力对这一货币的流通领域不断扩大所提供的种种机制和保证。这一点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过程中同样重要,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想要充当国际货币,一方面需要本国国家信用和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支持,同时也需要其他国家政府的合作来扩展本国货币在境外的流通范围。

其次,对于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主流经济学主要从经济活动“中介”的角度来分析。穆勒就认为,“货币从本质上来讲是最无意义的;它的意义只在于具有节省时间和劳动的特性。它是一种使人办事迅速和方便的机械,没有它,要办的事仍可办到,只是较为缓慢,较为不便”。^②休谟也不认为货币本身有任何的价值创造能力,“它不是贸易机器上的齿轮,而是一种使齿轮的转动更加平

^① L. Randall Wray, *Understanding Modern Money: The Key to Full Employment and Price Stabilit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8, pp. 18 - 19, 155 - 177.

^② [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胡企林、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4页。

滑自如的润滑油”。^① 现代经济学对货币的认识已经大为深刻,但基本上还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的“传统智慧”,认为在长周期内,货币对现实生活中各种“真实”的经济要素影响不大。货币数量论是这一思想的浓缩,用方程式表达就是 $MV = PY$ 。其中, M 代表流通所需的货币数量, V 是货币流通速度(一定时期内一张钞票的转手次数), P 是价格水平, Y 是实际总收入(一般用GDP衡量)。如果一定时期内 V 和 Y 一定,那么货币数量增减带来的只是价格上的变动。也就是说货币并不重要,并不能够改变真实财富的总量,长期来看,货币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中性”的。^② 这种理解忽视了货币数量的变化对社会财富所具有的“分配效应”,18世纪爱尔兰裔法国经济学家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比较早地对货币的这一效应进行了论述,他发现当货币供应量增加后,并不是所有商品的价格成比例的统一上涨,而是依赖于那些得到这些新货币的人对市场的判断和他们消费的方向,于是出现了一些经济部分的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要大于另一些部门。这好比如果河流的水量加倍,流速并不会因此而成比例地加倍。^③ 凯恩斯在其早期的著作《货币论》中对这一现象也进行了精辟的总结:货币变化不会以同一方式、同一程度或在同一时间中对所有的物价发生影响。^④ 这种结构性物价变动的后果就是改变了社会财富的分布,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所引起的“分配效应”是一个连锁反应式的动态过程,因为新增的货币量起初并不是同时到了所有人的腰包里,而是有一个先后次序。首先受益的人——如果货币为政府发行的纸币——则是财政部,他第一个得到了更多的现金持有量,可以为自己想要的商品和服务支付更多的货币,得到财政部货币的经济部门的产品因需求增加而价格上升,工资也会提高,而他们的支出偏好将决定接下来谁能够得到这些新增货币,如此一环套一环,新增的货币从一个部门流入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群体手中流入另一个群体,直到新增货币丧失其影响价格的能力。显然,能够越早得到新增货币的群体受益最大,因为在他们得到货币时,其他部门的物价还没有上涨,供求关系没有变化,这时他们手中的货币能够保持较强的购买力,从而及时得到其他部门所生产的实际资源;而越晚得到,甚至没有得到新增货币的群

① [英]大卫·休谟《休谟经济论文选》陈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9页。

② Robert E. Lucas, "Monetary Neutra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4, No. 4, 1996, pp. 661 - 682.

③ Richard Cantillon,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 edited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ntal Saucier and Mark Thornto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p. 161.

④ [英]凯恩斯《货币论》(上卷),何瑞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0页。

体将承受因经济流通中货币增加所带来的通货膨胀的痛苦,这时他们用手中等数量的货币将享受不到较早得到新增货币的群体已经得到的商品和劳务,在这一过程中财富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群体,结果是经济体系中财富与收入的重新分布。这就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所描述的“货币非中性”。^① 主流经济学并非没有意识到货币对社会财富所具有的“分配效应”,只是认为这不是它的研究对象。^②

通过对货币发行权的控制,政府不仅增强了自身的财政实力,并且能够决定和影响整个社会资金投放的方向、融资的成本和战略性物资的价格。也就是说,货币本身具备配置各种资源的能力,这样一种分配财富的权力政府绝对不会允许其落入旁人之手,无论是一国内部关于货币政策的争论还是国际上各国对国际货币体系安排的巨大分歧,其根源大都在于货币的分配效应。

再次,对于货币的本质,主流经济学认为是“交易的媒介”。货币让人类摆脱了以货易货这种原始贸易方式给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束缚,使得各种价值可以更为自由地在不同空间和时间进行交换。这让更大规模和范围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进而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市场的规模也随之扩大,而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分工朝更为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如此循环往复,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货币在其中体现的是一种不同商品持有人之间公平交换的关系。但是当我们把观察货币的视角从商品交易者之间转移到货币的发行者与持有者之间时就会发现,在现代社会的纸币本位下,货币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每一张钞票都是货币发行者对持有者的负债(更通俗地说就是发行者向持有者开具的欠条),当货币从发行者手中转移到持有者手中时,意味着货币发行者从持有者那里“借到”了一定量的商品和劳务等实际资源的使用权,并承诺持有者可以用这些货币来清偿与发行者之间的债务(缴税)或者将来某一天重新从发行者那里拿回这些实际资源。但是这种债权债务的双方是处于一种相互不平等的位置:货币的发行者——政府掌握着国家机器,并且垄断货币发行权,而每一个持有者只能被动地使用货币,货币发行者的这种优势地位使其可以非常容易地“赖账”(以通货膨胀的方式降低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另一方面,由于相互交易的需要,大量的货币实际上在持有者之间循环往复地流动充当交易的媒介,而永远不会再回流至发行者,向发行者索取货币背后所代表的实际资源,

^① [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货币非中性”,《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戴忠玉、刘亚平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78-79页。

^② Jonathan Kirshner, “The Study of Money”, *World Politics*, Vol. 52, No. 3, 2000, p. 426.

所以发行者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那些“借来”的商品和劳务,而不用考虑“归还”的问题。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国际货币发行国和持有国同样是一种不平等的债权关系,它为发行国占有他国财富提供了一种隐性的制度安排,而并非仅仅是一种基于自愿和效率原则所发展出的一种国际支付体系,所以国际货币关系中永远存在着国家间的权力争夺。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跨越本国的疆界越来越多地被其他国家所持有,意味着这个国家能够以低廉的成本“借入”其他国家的实际资源,这种债权看似平等,是一个国家自愿的选择,但实际上由于许多国家自己的货币在国际贸易中不被交易伙伴所接受,剩下的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就是出借本国的商品和服务给国际货币的发行国,换回由发行国开具的能够用于国际支付的“欠条”(国际货币)。比如目前大约有5000亿美元现钞在美国本土之外流通,这些美元现钞中的大部分将“沉没”在美国境外,这意味着美国可以“无偿”地占有这5000亿美元所代表的商品和劳务。但这并非没有风险,在国际层面,发行国和持有国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不同于在一国内部货币发行者和持有者是政府和个人这对不对等的主体,一旦这种债权关系的不合理达到一定程度,并且不能通过谈判进行调整,很容易引发国家间的激烈冲突,这是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二 美元霸权兴起的背后:市场的力量还是政治的力量?

美元兴起的历史为我们观察货币的政治逻辑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当1620年第一批欧洲殖民者抵达今天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镇并定居下来时,他们碰到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大家互通有无彼此交换物品时选择何种货币?由于这批移民并非富人,没有从欧洲大陆的母国带来大量可供流通的货币,于是实物货币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选择。之后许多地方政府允许居民用玉米或者烟草来缴税,并且规定这些实物货币不仅可以用于公共支付,也可以用于私人交换。当时马萨诸塞规定玉米为法定货币,康涅狄格为小麦,弗吉尼亚为烟草。^①

但是随着北美殖民地人口的增多和经济的发展,实物货币在履行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价值储藏的功能时越来越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建立殖民地自己的造币厂发行货币势在必行。但当时英国不允许殖民地开办自己的造币厂,而是

^① Barry Eichengreen,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0.

要求殖民地用实物商品从英国进口货币,以此来解决殖民地的货币供应问题。^①这对英国而言是一笔相当划算的交易。英国仅需花费少量的铸币费用就可以享有殖民地提供的大量实际资源(农产品、工业产品以及劳务),因为殖民地没有铸币权,需要使用英国的货币用于自己内部的日常交易,所以这些从英国进口的货币大多将会永久地“沉没”在殖民地,英国不必担心这些出口到殖民地的货币会回流到英国换取英国的实际资源,只要这种货币安排一直存在,英国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以少量的铸币成本享受殖民地经济发展的成果。当时英国在殖民地的总督也允许殖民地的公共储蓄机构发行一些信用券来作为铸币的补充进入市场流通,但英国议会在1751年禁止殖民地发行这些信用券,这引起了殖民地的强烈不满。限制北美殖民地的货币权力,成为英国和殖民地之间关系紧张的重要根源。^②对于北美殖民地而言,反对伦敦的动力不仅仅来自“无代表权不纳税”,“无代表权无(义务遵守英国的)货币政策”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③

通过独立战争北美殖民地从英国人手中收回了货币权,但货币的发行并未统一于联邦政府,各州都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当时的美国仅仅是一个由十三州组成的松散联邦。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主张加强联邦政府,将十三个州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他将统一的货币视为一种有效的黏合剂,于1791年1月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建立铸币厂的报告。1792年,国会在此报告的基础上制定通过了《铸币法案》。自此,美国才有了统一的货币。

独立后的美国经过领土扩张和工业革命,经济发展迅速,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这时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角色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时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中一半是英镑,同时不仅仅法国法郎、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就连意大利里拉、比利时法郎和奥地利先令在世界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例也高于美元。但是到了1924年,美元在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外汇储备中的比例就已经超过了英镑,而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的以美元计价的各种商业融资票据则是英镑的两倍。^④短短10年,美元的

^① Barry Eichengreen,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② [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货币简史》,苏世军、苏京京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③ Henry L. Bretton, *The Power of Money: A Political - Economic Analysis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1980, p. 29.

^④ Barry Eichengreen,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 32.

国际地位实现了从零到超越的巨大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4年美联储的建立是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力量。前者大大动摇了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为了避免出现类似1907年的金融危机而建立的美联储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保持国内金融货币秩序的稳定,同时又不失时机地主动出击建立本土商业票据市场,利用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采取各种措施吸引欧洲各国政府和私人机构到美国融资,为美国金融机构发行以美元计价的商业票据提供支持,使美国企业在本国就能享受到优惠和便利的进出口信贷,而以前很多美国企业不得不到伦敦筹资。美元的国际化客观上要求一个以美元计价的庞大的商业融资票据市场的出现,以吸引众多投资者持有美元。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因为当时美国的银行业还没有能力建立这样一个市场,一则成本高昂,另外如何让国内外的投资者熟悉这个市场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与其说是依赖市场的无形之手,倒不说是多亏了美联储纽约分行第一任主席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的有形之手。斯特朗十分欣赏英格兰银行通过商业票据市场管理信贷的做法,一心要在美国也建立一个能够与之竞争的市场,从而促进美国产业的竞争力,扩展美国的对外贸易。斯特朗的努力最终获得了整个美联储的支持,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各美联储分支机构成为这些商业票据商的主要交易对手,并且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在一战后的动荡年代,许多国外机构也被吸引过来,美国的商业票据市场最终超过了英国。^①

美元霸权的真正确立是在二战之后,它的首要对手是英镑。战后英国的实力虽然受到重创,但英镑依然是重要的国际货币:一是因为英联邦成员大量持有英镑;二是因为战争,英国停止了英镑的自由兑换,英镑外汇持有者除了继续持有和使用外别无他法,他们不能将其自由兑换为黄金或其他货币。而此时英美财政部之间为了战后国际金融贸易秩序的安排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谈判,英国争取从美国获得贷款重建经济也是谈判内容之一,经济学家凯恩斯是英国的谈判代表。但正是在贷款条件问题上,这位英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美国当时同意提供英国贷款,但前提条件是英国必须在1947年7月15日前实现英镑的自由兑换。凯恩斯同意了这一条件,并积极游说英国议会批准贷款协议。暂停英镑自由兑换对战后稳定英镑价值非常重要,在英国经济还

^① Barry Eichengreen,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p. 28-30.

没有完全复苏前如果恢复自由兑换风险极大,英镑和以英镑计价的资产的价值会一落千丈,英镑最终也会崩溃,这对英国的战后重建无疑是重大打击。果不其然,当英国如期放开英镑的自由兑换后,其他国家居民迅速将所持英镑兑换为美元以购买美国产品,英国仅第一个月就损失了1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当时英国所有的黄金和美元储备还不到25亿美元,英国只能暂时放弃。到了1959年英镑实现自由兑换后,英镑在外汇储备中份额还停留在1940年代的水平,而美元则增长了三倍。^①英镑彻底出局了。

根据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汇率固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贸易逆差国融资。从运行机制上讲,这并不意味着各个国家都要使用美元来进行交易,特别是在非美国的贸易伙伴之间。因为在这个“双挂钩”的体系内各个国家的货币都有含金量,都可以充当储备货币。但这一看似完美的机制在战后实际上无法启动,因为当时在西方国家间除了美元外,任何国家的货币都不具备为其他国家接受的信用,缺少用来进行国际支付的硬通货,国际贸易根本无法开展,这一时期也被称为“美元荒”(Dollar Shortage)。是美国在欧洲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以及援助日本的“道奇计划”使得日本和西欧国家获得了大量美元贷款和美元投资,相当于各国都拿到了一笔进行国际贸易的美元“启动资金”,自然而然地,各国的交易也都用美元来完成。国际贸易活跃起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才真正运转起来,而美国大规模对外援助计划的一个后果就是美元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所以一些观察家才认为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应该叫布雷顿森林体系,应该叫“马歇尔-道奇固定汇率的美元本位制”。

美元的主导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受到冲击,这主要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特里芬困境”和“n-1问题”不能得到解决,^②由于约翰逊时期的“伟大社会”计划以及越战,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急剧恶化,许多国家对美元的价值

^① Barry Eichengreen,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p. 39-40.

^② “特里芬困境”是由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在1960年出版的《美元与黄金危机》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充当国际货币,那么一方面,随着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规模的增加,对该国货币的需要也随之增加,这就要求该国通过国际收支逆差来实现,但这就必然会带来该货币的贬值,从而打击其作为国际货币的信心;另一方面,作为国际货币又必须要求货币币值比较稳定,维持信心,而不能持续逆差。这就使充当国际货币的国家处于左右为难的困境,由此被称为“特里芬困境”。约翰·威廉森在1983年出版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书中提到,在由n个国家组成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任何n-1个国家都可以自由改变汇率,但只有一个国家,即充当国际货币角色的n国不可以改变其汇率,因为其货币币值其他国家货币价值的基准。如果所有国家,包括发行国际货币的n国都因为自身利益而改变汇率时,将会引起相互之间的冲突。

能否保持稳定提出了疑问,对美国依靠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所享有的“过特权”愈加不满,^①戴高乐政府从1965年开始将自己大量的美元储备向美联储兑换黄金,逼迫美国减少贸易赤字,改革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②但以失败告终。在整个60年代美国还有能力维持美元国际储备的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来自“顺差大户”德国的支持。考虑到美元价值的不稳定,德国联邦银行也曾想步戴高乐的后尘将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但美国政府以从德国撤出美国驻军相威胁,使得处于东西方对抗桥头堡地位的德国不得不以安全问题为重。时任德国联邦银行行长布莱辛亲自向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鲁萨保证德国联邦银行将不会改变储备管理政策。作为当时最大的美元储备国,德国不抛售美元资产的承诺对美元的稳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冷战的背景下,德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使其不得不接受“安全-货币”这一美德关系结构的制约。^③而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关于“石油-美元”的协议是保证美元储备货币地位至今仍难以撼动的另一主因。1974年两国建立的由双方财政部长领导的“经济合作共同委员会”是保证这一协议的重要机制,通过这个委员会美国说服沙特,其生产的石油用美元计价,而美国则为沙特积累的大量石油美元重新回流到美国获取投资回报提供特殊承诺,并且给予沙特安全保证。石油这种国际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和结算,保证了美元在世界范围内大量使用,将石油贸易紧紧捆绑在美元身上,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当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在1975年达成共识,将石油价格与SDR(特别提款权)挂钩时,美国调动各种资源成功迫使沙特放弃该计划。而作为OPEC最大产油国沙特的退出,无疑使石油价格脱离美元与SDR挂钩的计划泡汤。但作为回报,美国同意提高沙特在IMF的投票权。^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摆脱了“黄金枷锁”,不再担负向各储备国中央银行兑换黄金的义务,并且不再和任何贵金属、实体商品或者价值单位挂钩,美国由此可以不受制约地决定美元的发行量。由于各国对美国经济军事实力的信赖以及美元在国际经济往来中事实上的广泛应用,美元仍然扮演着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并且享有比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更大的霸权,真正拥有了制定全球货币政策的特

① 这是戴高乐的经济顾问雅克·鲁夫批评美元时所用的词汇,经戴高乐引用后广为人知。

② Michael D. Bordo et al., "France and The Bretton Wood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1960 to 1968", NBER Working Paper, No. 4642, February 1994.

③ Francis J. Gavin, *Gold, Dollars, and Power: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1958-1971*, The University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pp. 135-164.

④ David E. Spiro, *The Hidden Hand of American Hegemony: Petrodollar Recycling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80-102.

权。美元霸权兴起的过程中,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始终如影相随。

三 欧元与人民币:美元的全球竞争者?

二战后美元的主导地位能够一直持续半个多世纪,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元缺少真正的竞争对手。那么欧元和人民币是否有资格和能力与美元同台竞技?其实从欧元诞生之日起,关于欧元能否挑战甚至取代美元国际地位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①“挺欧派”与“倒欧派”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自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倒欧派”明显略占上风,他们“看空”欧元的基本理由:如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分离、单一的货币政策与欧元区各国不同经济状况之间的矛盾、欧元区债券市场的不统一、欧元治理结构的缺陷以及欧元区经济增长的缓慢等等,似乎在欧债危机中全面地应验了。据此,“倒欧派”认为,欧元非但不能取代美元反而有最终崩溃的危险,最好的结局也就是成为一种地区性货币。其实“倒欧派”的分析非常正确,只是这些分析有意无意所遵循的仍然只是货币的经济逻辑,而忽略了货币的政治逻辑。

“倒欧派”的重量级元老马丁·费尔德斯坦一直坚持认为欧元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对欧元的打压也是不遗余力,但欧元毕竟还是坚持存在了超过10年,并未如他所言而消亡。费尔德斯坦对此的解释是:第一,支持欧元的政治精英相信,欧元给了欧元区在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要地位。如果没有欧元,单个的欧元区成员国是不可能享有这样的地位的;第二,德国企业界会支持用本国税收维系欧元的做法,因为他们意识到德国受益于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元区的其他成员国无法通过贬值本币同德国展开竞争;第三,投资者需要欧元来分散美元的风险。在希腊危机开始前,投资者就开始悄悄地将资金分散到欧元资产中去。他们暂时停止是因为对欧元的未来感到不确定;第四,大家终将认识到周边国家的问题并非欧元的问题。^②费尔德斯坦所讲的实际就是一个货币的政治逻辑,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强调的“欧洲货币联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欧元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欧洲的失败”。^③而这种失败的政治后果是任何一个欧

^① 巴曙松和杨现领对于这些争论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文献综述,参见巴曙松、杨现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美元与欧元之争:文献综述”,《西南金融》2009年第4期。

^② [美]马丁·费尔德斯坦“欧元的未来: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http://cn.wsj.com/gb/20110315/opn082143.asp,2011年3月15日最后登录。

^③ Http://edu-politik.de/2010/05/21/europa-braucht-eine-neue-stabilitaetskultur/,2010年6月15日最后登录。

洲领导人都难以承受的,所以我们看到默克尔在德国经济界的压力下转变态度,努力说服国内选民,出钱出力拯救欧元,而欧洲各国的政治领导人也最终能够相互妥协退让,建立了永久性危机处理机制,一步步将政治一体化推向深入;而在国际上,中国从战略大局出发,不希望出现欧元崩溃而美元一币独大的局面,频频表示要力撑欧元,主动对欧洲施以援手,这对于维系欧元的信心和稳定欧元的价值发挥了重要作用。

欧元的创建在本质上是一项政治工程,虽然统一货币的思想在欧洲由来已久,但真正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的推动力是德国重新统一的刺激。没有这段历史,无论是让法国人放弃象征法兰西民族辉煌的法郎,还是让德国人放弃集中代表战后德国经济成就的马克,都是不可能的。在巨大的政治变迁中诞生的欧元最大的弱点恰恰在于政治:欧元是一个没有国家的货币。^①现代货币都是信用货币或者“法币”,其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仅是一些花花绿绿的纸片,之所以它能够日常经济活动中作为清偿手段被普遍接受,在于其背后国家主权的强制力和信用程度。恰恰在这一点上,欧元是一种典型的内在“弱政治性”货币。欧元真正成为一个全球货币与美元竞争需要两个前提中的任意一个:或者欧盟政治一体化更为深化,能够发行媲美美国财政部债券的欧元区债券;或者美国的经济政策出现重大失误。^②从目前欧盟发展的情况看,第一种前提出现的可能性正在逐步增大。因为欧元政治上的弱点同时也是它的优势,它迫使欧洲领导人能够超越狭隘的短期利益,在更高的政治战略层次上把握欧元的未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步伐在逐渐加快。2011年5月24日,欧盟委员会代表欧盟发行了47.5亿欧元的10年期债券,所筹资金将通过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M)对陷入债务危机的成员进行救助,这是欧盟继2011年1月和3月两次发债之后在本年度的第三次发债,市场对此反应良好,三次总共筹集了144亿欧元。^③到2013年7月,资金规模更大的欧洲稳定机制(ESM)将会启动,这一机制的设立是欧洲一体化走向深入的重大步骤,它不仅改变了之前《稳定与增长公约》所坚持的为了避免“道德风险”而对陷入财政危机的成员国采取“不救助”的“旁观立场”,使得欧元资产的投资者和持有人对欧元的信心和

① Otmar Issing, *The Birth of the Eur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28-234.

② Barry Eichengreen,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 135.

③ EU Press Releases,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MEMO/11/336>, 2011年5月31日最后登录。

兴趣大为增强,更重要的是ESM的建立使得欧盟发行统一债券的行为机制化、常规化和永久化。虽然未来ESM发行的债券还属于“专门目的型”的金融工具,还只是局限于处理和应对未来成员国可能出现的财政危机,并不是通常意义上国家政府为国家“日常建设和运转”所筹资发行的国债,但有了这个雏形之后并不排除今后ESM债券发展成为取代目前各成员国政府单独发行的国债,进一步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欧元区统一债券甚至欧盟统一债券,到那时欧盟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容量将会得到数倍提升,欧元将真正成为一种全球货币。当然,这个过程将是缓慢的,但并非不可预期。

许多观察家对于人民币在短期内成为能与美元竞争的国际货币并不看好,因为人民币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人民币投资产品还很缺乏、中国金融机构的透明性和效率还有待提高,中国证券市场狭窄并且资产流动性较差,特别是目前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以及中国所实施的资本管制措施等。^①但正如一战严重地冲击了英镑的国际地位一样,目前美国的巨额赤字也在侵蚀着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就像当年美联储为在纽约建立一个国际商业融资票据市场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一样,目前中国政府正在竭尽全力将上海打造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②美国抓住时机用了10年时间,中国未必不能做到。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和具体的路线图很多学者都已经进行了大量讨论,但人民币国际化的政治后果——政府对资源的分配和控制能力的变化——可能更值得深思。在我国目前金融市场格局中,银行业特别是国有银行占据主导地位,证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落后,投资渠道少,企业和个人的闲置资金大多选择存放银行,并且也主要通过银行信贷进行融资,正是在这种格局下,政府一方面可以较为容易地将信贷资金有意识地引导至其所偏好的行业和企业,同时政府也可以直接从拥有大量居民存款的国有银行以较低的成本借钱,自己直接进行投资建设活动。这是我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方式的重要体制基础。而人民币国际化必然要发展流动性好、容量大和自由化的证券市场,如果国外的公司和金融机构被允许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并且假如国外机构发行的债券回报率更高、品种更丰富,国内居民将会选择不把资金变成低收益、甚至负收益的储蓄存进国内银行,而是直接用来购买这些国外机构的金融产品,这将会削弱中国政府对国

^① Benjamin J. Cohen, “Toward a Leaderless Currency System”, in Eric Helleiner and Jonathan Kirshner eds., *The Future of Doll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55 - 156.

^② Barry Eichengreen,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 33.

内储蓄的引导和控制能力,这对我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方式是一种挑战。同样地,人民币国际化也要求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使人民币在国际外汇市场自由交易,这必然又会引起人民币汇率机制的重大变革,进而影响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目前虽然受到了很多批评,但大量存在的出口企业不仅仅关系到经济效益,更是和就业、社会稳定、收入分配等政治社会问题密切相连。所以说,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成本收益计算,而是更多地涉及国家体制层面的政治权衡。资深金融专家夏斌在其新著《中国金融战略2020》的结尾处所写的话耐人寻味:正确的金融发展道路也是有“轨迹”可循的。同时,相信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的人,会同以下观点: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挑战,其实不在经济本身,而在经济之外。^①

四 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市场过程还是政治过程?

按照通行的标准定义,国际货币体系就是指在跨越国家疆界的交易活动中,为支付和收款所形成的一系列协定、规则、惯例和制度安排一般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②第一,如何安排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第二,国际收支失衡如何调节;第三,国际货币(储备货币)的确定。看到这个定义,许多非金融领域的人士可能会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好像是一个非常遥不可及和复杂庞大的问题。其实并非这样,国际货币体系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的人们如果进行交易活动,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所交易的商品值多少钱?这个价格是用买家的货币还是卖家货币,抑或是其他第三种货币来标的?如果买家手头没有卖家所要求的货币,那么买家该怎么办?如果卖家收到的货币不能在本国境内流通,那么卖家又该如何处理这些货币呢?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频繁,类似的问题不断地大量涌现,国际货币体系就是在解决这些不同国家居民在经济活动中相互支付的问题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中最为根本和核心的问题就是:国际贸易中用哪一种货币进行结算?这些货币如何获得?被确定为国际贸易支付手段的货币就是国际货币。对于个人而言,能够尽可能多并且便利地获得国际货币意味着自己的经济活动可以在国门之外持续扩展,分享他国文明的发展成果,随之而来的就是自身福利的不断提高。推而广之,一个国家整体上获得国际货

^① 夏斌、陈道富《中国金融战略2020》,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4页。

^② Rober Solom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1945-1976*,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7, pp. 5-6.

币的数量越多,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从外部世界汲取实际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就越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所以任何国家都会倾向于无限地占有国际货币(用金融术语讲就是获取无限的国际流动性),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干脆将自己国家的货币变成国际货币,这在现实世界中就表现为国家竭力扩展本国货币的适用范围,也就是“流通域”,各国货币竞相角逐“流通域”的过程就叫做“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而所谓“货币战争”在最本质的意义上就是各国对本国货币“流通域”的争夺。^①

那么货币“流通域”的扩张是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还是需要国家权力主动的介入?常见的观点认为,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是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因为币值稳定、信誉好的货币自然受人青睐,欧洲中央银行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在谈到欧元的国际地位时,其中主要的经济因素在于低通胀率、开放的市场和发达的金融体系。基于此,欧盟对欧元的国际化保持中立,既不主动推进也不刻意阻止。^②但实际上,欧盟对欧元“国际化”的态度并不消极,比如欧洲央行在2002年欧元现钞进入流通领域时发行了500元的大额钞票,但在实际生活中,使用500元大钞是非常不便和不受欢迎的,许多欧盟国家的超市和加油站都拒收这种大钞。但根据意大利央行的一份报告,欧元大面值现钞的发行量却在逐年增加,2002年50元面值的钞票占欧元流通货币总量的34%,500元占23%;而到了2010年2月,500元升至36%,50元则下降到31%;2002年流通中的500元钞票总额为308亿欧元,而到了2010年则达到了2850亿欧元,年增长率达30%。为什么这么一种在正常交易中很少被使用的大额钞票的规模和发行量增长如此之快?谁在使用它?欧洲央行发行它的目的是什么?其实500欧元大钞的需求方分两类:一是游离于各国政权体制之外、基于现金交易的全球“地下经济”(毒品交易、走私等),500元和200欧元现钞是全球犯罪经济中最受欢迎的币种;二是金融系统脆弱或者社会动荡的中小发展国家。发行500元大钞不仅使欧盟获得了可观的铸币税收入,这同时也成为欧元“曲线国际化”的重要途径。^③在欧洲央行决定发行200元和500元的大额现钞时,当时的美联储立即作出反应,曾经一度决定也要发行500元的美元现钞与之抗衡,以保护美国在

^① 关于“货币流通域”的概念和内涵,参见张宇燕、张静春“货币的性质与人民币的未来选择——兼论亚洲货币合作”,《当代亚太》2008年第2期,第20页。

^② Jean-Claude Trichet, Speech at the “Schierensee Gespraech”, European Central Bank, 14 May 2004.

^③ 赵柯“中欧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能否合作”,《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3期。

海外的铸币税收入。^①所以说,政治推动力在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并非仅仅是一个市场的过程。

有学者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并非只能容纳一种主导货币,未来欧元和人民币都可能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但这并不代表美元的衰落,而只是意味着美元有了竞争对手。未来真正决定美元命运的有三个因素:市场的选择、地缘政治和美国人自己。只要美国能够下决心削减赤字,避免经济决策的失误,那么除了美国人自己无人能撼动美元。^②这个结论显然过于乐观了,它低估了政治对货币国际化的作用,政治在这里可以从两种渠道施加影响:^③第一种是间接的,比如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内政治、军事体制的变迁。战后美元国际地位的维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世界主要经济体,同时也是美国的盟友——西欧和日本——的通力合作,所以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签订的《史密斯协定》和1980年代的《广场协议》中,美国的利益和意图基本上都能够得到贯彻。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传统盟友特别是欧盟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明显降低,同时欧盟政治一体化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在欧债危机以及最近中东北非发生的政治动荡中都有体现,特别是总以“民事力量(Civilian Power)”示人的欧盟在此次对利比亚的空中打击中积极主动,频频显示自己的“军事肌肉”。如果暂且不论欧盟国家这种行动方式的对错与合法性问题,政治凝聚力的提高和军事力量的强化无疑有助于稳定欧元的信心。这些变化都预示着美国将来迫使其盟友全力支持美元的难度加大,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以中国、巴西和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中美国、欧洲和日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全盘主导,而美国能否在货币问题上取得这些非传统盟友的新兴大国的支持,也是一个问号。

政治发挥作用的第二种渠道是直接影响,政府可以直接通过政治力量推广本国货币,限制别国货币。在这方面比较引人注意的是俄罗斯,从2006年起俄罗斯开始了一系列的“去美元化”行动,普京在公开讲话中也高调宣布要扩大卢布在国际交易中的使用,并为此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比如俄罗斯主要的证

^① Benjamin J. Cohen, “The Euro and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in Thomas L. Ilgen eds. *Hard Power Soft Power and the Future of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Ashgate, 2006, p. 83.

^② Barry Eichengreen,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③ Eric Helleiner,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What Future for the US Doll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 2008, pp. 354–378.

券交易市场从2006年6月开始使用卢布来交易石油期货,大型商业银行停止发放美元贷款;从2007年1月开始不再接受在俄外资企业用美元纳税,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世界上第三大外汇储备国,俄罗斯开始大量减持美元资产。2004年,俄罗斯外汇储备的70%是美元资产,而目前已经下降到一半左右,而欧元资产增加到将近40%。^①受制于有限的经济规模,俄罗斯的这些措施短期内并不会对美元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其长期效应不容小觑。中东则一直是“美元货币圈”的核心地带,由于石油与美元之间存在的特殊紧密联系,美国一直通过各种手段在中东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严防外人染指。而欧盟虽然早已制定“东进”和“南下”的两手战略,但是为了避免刺激美国(虽然欧盟已经成为中东地区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对中东的出口远超美国),欧元的扩张主要还是体现在“东进”,在“南下”方面乏善可陈。但这次中东北非事件的一个可能后果就是:维持美元在中东地区主导地位的坚固防线会被打开一个口子。相较美国之前的犹豫和迟疑,以英法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在打击利比亚的问题上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并且今后很可能派出地面军事力量。靠着“打出来”的话语权,可以预见在日后利比亚以及其他中东北非地区重建问题上,欧盟同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将大为增加。2011年5月26-27日,在法国小镇多维尔举行的八国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对中东北非国家的援助,其中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八国集团的援助行动将通过国际机构实施,除了IMF和世界银行外,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名列其中。^②可以想象,重建工作启动后欧元在中东的扩张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只在于美国能够容忍的程度是多少。从历史经验来看,大规模的对外援助是货币扩张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而在全球层面,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债务危机使得中欧在货币领域的合作进入双边关系发展的议事日程。在通过IMF加强全球金融体系的治理,以及约束美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方面,中欧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中欧在金融货币方面的合作如果能够顺利开展,虽然不至于要置美元于“死地”,但却会给美元“过度的特权”套上一个“紧箍咒”。

通常来讲,国际货币体系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建立:放任市场的力量自发形成;由一个霸权国主导;几个大国有意识地协调合作。^③在世界经济格局多元化

^① Juliet Johnson, “Forbidden Fruit: Russia’s Uneasy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Doll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 2008, pp. 388 – 395.

^②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http://cn.wsj.com/gb/20110530/beu085400.asp>, 2011年6月2日最后登录。

^③ C. Fred Bergsten, *The Dilemmas of The Dollar: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75, p. 19.

的今天,新兴经济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越来越重,通过大国间的谈判协调和相互妥协来建立相对公平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显然更为现实可行。所以,美元的未来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美国同其他全球性政治力量的相互关系。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过程。

结 语

凯恩斯在其1919年的著作《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有一句被广泛引用的名言:颠覆现存社会基础最精妙、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摧毁它的货币。这一过程调动了经济规律中所有具备破坏性的隐藏力量,并且以一种百万人之中也难有一人能识别出的方式进行。^①也就是说,货币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力量,一种权力,并且蕴藏的破坏性极大,通过持有、借出和转移货币可以达到自利的目的。^②而凡是权力存在的地方,政治逻辑就永远起作用。有关国际货币体系的争论的中心问题实际上就是收入和政治权力在国家间和一国内部的分配,对于调节国际收支和安排国际储备有许多技术上可行的解决方案,但是不同的解决方案对不同的国家以及一国内部不同的群体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③利益的分配才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之所以充满争议和阻力,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货币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然后才是经济问题。

(作者简介:赵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研究系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张海洋)

^①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9, p. 220.

^② Jonathan Kirshner, "Money is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 No. 4, 2003, p. 646.

^③ C. Fred Bergsten, *The Dilemmas of The Dollar: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1975, p. 6.

32 German Public Diplomacy towards China: with the “Deutschland und China: Gemeinsam in Bewegung” as an Example

JIANG Bei WU Huiping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history of German public diplomacy and its main features. Throug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eries of activities on “Deutschland und China: Gemeinsam in Bewegung”, a typically proactive public diplomacy practice, i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the German practice on public diplomacy towards China, especially its strategy, organizational model, institutional settings, actors, main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and other aspects worthy of learning.

50 The Political Logic of Money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ZHAO Ke

Money is a kind of power rather than a medium of market deals, which not only has a “distributive effect” over the social wealth, but can directly create wealth for the money issuers. Money would never have emerged nor been generally accepted in commodity and service transactions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state power. This is the political logic of money. It leads to the fact that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for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to follow the logic of market based on efficiency, which is, on the other hand, flooded with game playing between the great powers. The rise of US – Dollar depends more on the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US government than on its own competitiveness. The future of the Dollar will be decided not only by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Euro and RMB, but by the issue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traditional western alliances will support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Dollar and whether the emerging economies like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will coopera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money issue.

69 The Network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CAO Dejun CHEN Jinli

“Relationship” has been highlighted as a core of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paradigm which emphasizes overstepping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s of variable and typological analysis. That is, the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paradigm underlines neither “attribute data” nor “ideational data”, but “relational data”. It insists on reconciling the “agent – structure” problem by an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 This new way of thinking has great implications for us to rethink the decentralization, flow and changing tendenc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ower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